

巴蜀文化志

(修订本) 袁庭栋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巴蜀文化志

本书由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资助

(修订本) 袁庭栋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一节 释“巴”、“蜀”	1
第二节 关于“巴蜀文化”.....	6
第三节 巴蜀文化的兴衰轨迹.....	7
第四节 巴蜀文化的基本特征.....	15
第二章 地理.....	19
第一节 地理位置与文化发展.....	19
第二节 气候条件与文化发展.....	20
第三节 地形特点与文化发展.....	22
第四节 地理环境与行政区划.....	25
第三章 民族与人口.....	30
第一节 以巴族、蜀族为主的巴蜀先民	30
第二节 盆地内汉民族的形成.....	35
第三节 两千年的人口增减与文化兴衰.....	39
第四节 盆地周边的主要少数民族.....	47
第四章 科技.....	57
第一节 水利.....	57
第二节 冶金.....	67
第三节 钻井术与井盐开采.....	72

第四节	天然气与石油开采·····	79
第五节	造纸与印刷术·····	86
第六节	医药·····	94
第七节	历算·····	103
第八节	织锦·····	108
第五章	学术·····	113
第一节	教育·····	113
第二节	古代巴蜀学术管窥·····	119
第三节	特色显著的汉代学术·····	122
第四节	宋代蜀学·····	126
第五节	明清时期学术的衰落与复兴·····	135
第六章	艺文·····	144
第一节	尚待完全揭破的三星堆之谜·····	144
第二节	生生不息的民间歌舞·····	148
第三节	汉代文章冠天下·····	156
第四节	独绝一时的汉代造型艺术·····	162
第五节	唐宋诗人多入蜀·····	168
第六节	西蜀画派·····	178
第七节	源远流而又多源的川剧·····	183
第七章	宗教·····	193
第一节	古巴蜀的原始宗教·····	193
第二节	道教的产生与传播·····	195
第三节	道教圣地青城山·····	200
第四节	从南方传入的佛教·····	205
第五节	大佛之乡·····	208
第六节	佛教圣地峨眉山·····	214
第七节	基督教入蜀三百年·····	216



第八章 民俗.....	221
第一节 川味饮食名满天下.....	222
第二节 茶饮之乡.....	235
第三节 游乐之盛.....	238
第四节 遍布城乡的袍哥.....	243
第九章 交流.....	256
第一节 蜀道难与蜀道通.....	256
第二节 通向南方之路.....	268
第三节 兼容与辐射.....	274
第四节 湖广填四川.....	281
代结束语:巴蜀文化尚待探索的若干问题	287
参考文献.....	289
后 记.....	295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释“巴”、“蜀”

四川地区古称巴、蜀，最早是巴、蜀分称，以后则巴蜀合称。然而无论是巴或蜀，在古文献中的内涵与外延都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巴蜀由来古，殷周已见传。”^① 不过，无论是殷周的甲骨文还是金文，都未见到巴的记载。这可能是一个偶然现象。有一些学者认为甲骨文中有“巴方”、“巴甸”，地域就在今汉水、丹江之间，殷武丁时期就曾与殷王朝发生过较大的战斗。^② 但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迄今为止，甲骨、金文都未见巴字，现在部分学者所释定的“巴”字乃是误解。这一古文字的考释问题不可能在这里展开讨论，我只想指出，在学术界具有很高学术地位的几部古文字学巨著，如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综类》、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释》、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和《汉语大字典》，都不认为甲骨文中巴字。

巴字在古文献中最早出现于《山海经》，而且是以地名与国名出现，如“西南有巴国……后照是始为巴人”，“是司神于巴”，“巴蛇食象”。这以后，则见于《逸周书》、《世本》与《左传》。最初的巴，应是一个古老民族之名，其活动范围

① 引自郭沫若 1960 年 2 月参观重庆博物馆巴蜀文化陈列后所题诗句。

② 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性论述见董其祥：《甲骨文中的巴与蜀》，载《巴史新考》，重庆出版社 1983 年版；段渝：《四川通史》第 1 册第五章第二节《巴方史迹》，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巴蜀文化志

包括今川东^①、川北、陕南、鄂西乃至洞庭湖一带的广大地区，而鄂西应是其中心。在这个广大地区内的民族应当是有支系、有迁徙的，也并不来自一个族源，但巴族是其主体，故而相关各支系都曾被称之为巴人。这其中，有的与周族关系密切，姬姓，即宗姬之巴；有的是属于南方的濮人系统，即后世称为廩君蛮的廩君之巴；有的是属于夏人后裔，即丹山之巴；有的是属于太皞之后，即后照之巴；有的是活动在今川东地区、后世称作板楯蛮的賁人之巴。所有这些在巴地生息繁衍的人们，被后世统统称之为巴人，他们所活动的地区也都可以称之为巴，于是“巴”也就由民族名演变为地域名。

殷末周初，巴人参与了伐纣之役，“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华阳国志·巴志》），于是巴族的一部分从此姓姬。巴地最早与中原有联系的诸侯国可能就是在这时建立的，这就是古文献中所称的巴国或巴子国，也就是巴地诸族的核心。公元前703年，“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杀道朔及巴行人……邓师大败”（《左传·桓公九年》）。这是巴作为一个诸侯王的军事、外交活动首次见于文献记载。这以后，巴与楚联合灭申、灭庸，显示了强大的实力。《左传·昭公九年》载：“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巴被列于周王朝的南方诸侯之首，用后来荀子的话说，属于“天下之显诸侯”之列（见《荀子·儒效》）。不过，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巴国，主要活动范围都在汉水流域，不在今四川境内。春秋末年，由于巴、楚联盟破裂，兵戎相见，“数相攻伐”。在“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华阳国志·巴志》）的情况下，巴国的统治中心逐步向南转移，先至鄂西南的清江流域，然后沿清江西上进入川东，到战国初年，其统治中心已在川东，而且不断迁徙，“巴子时虽都江州（今重庆），或治垫江（今合川），或治平都（今丰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今涪陵）”（《华阳国志·巴志》）。直至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俘巴王，巴国亡。这段时间，“巴”主要是作为国名。

秦灭巴国之后，在巴国原地设置巴郡，治江州（今重庆）。巴郡之设，汉、

^① 自元代以来，四川盆地作为一个行政区域即称为四川。多年来，“四川”已不仅是一个地域的名称，也是一个地域文化的名称，四川文化也就是已经称呼了多年的巴蜀文化。1997年，原川东地区分治，建立直辖的重庆市。但是我一直认为，川渝本一家，文化上更是一家，单一水系的四川盆地从来都是一个整体的地域文化区，川东文化与川西文化很难分开，巴文化与蜀文化很难分开，有如“川味”、“川腔”、“川菜”、“川剧”的“川”永远都包含着重庆一样。正是为了尊重这种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传统，也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在本书中所称的“四川”或“川”，都是指整个四川盆地，也即是从元代到当代的四川、分治之前的四川，都包含今天的重庆市在内。



晋因之。这以后，东汉还设置了巴东郡（治今奉节）、巴西郡（治今阆中），东晋在巴西郡（治今南部）之外又设置了北巴西郡（治今阆中）、新巴郡（治今江油），刘宋设置了巴渠郡（治今达县），齐设置了巴州（治今奉节），梁又设置了东巴州（治今南江）、宁巴郡（治今宣汉东林）、巴中郡（治今开江）、开巴郡（治今宣汉普光），北周设置了巴县（治今重庆）、三巴郡（治今宣汉普光），唐代设置了巴川郡（治今合川）。直到清代，重庆市中区仍称为巴县。所有这些行政区划之设置，充分表明了“巴”作为一个地名在古代巴国范围内使用之广。正由于“巴”作为地名的普遍使用，当唐代在今川东地区不再设巴郡之后，人们仍习惯于将川东地区称为巴。到了现代，虽然在原来的巴地用作地名的只有巴南区、巴中市、巴州区等几个地方，人们仍习惯于将川东地区称巴。所以，在近代，巴就从过去的行政区划之称，转化为普遍使用的代称。

蜀字不仅见于殷墟甲骨文，也见于周原甲骨文。当时蜀已是一个方国的名称，或一片地域之称。在这个地域之中，其主体民族是蜀族，这个方国或地域被殷人称之为蜀，当然也是源于蜀族。蜀族本身也是一个多源的复合型民族，但从整体上来看，蜀族的族系与分布较之巴族要单纯而明晰得多。蜀族本是氏羌族的一支，早期活动地区在岷江上游山谷之中，逐渐发展到成都平原与陕南，长期以成都平原为根据地。在今川西至陕南的广大地区之中的古老民族，则都被称为蜀人或蜀族。

川西的蜀族很早就进入了文明的大门，建立了古老的国家，有了蜀王。古蜀王国的历史轮廓，幸赖有扬雄的《蜀王本纪》一书作了简略的描述：

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凡四千岁。

这个记载对古蜀王国经济文化的总的估计是不确的，与实际相比明显偏低。但对几代蜀王的记载，应当是有根据的。蚕丛氏主要活动在岷山山地，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境即汉代的蚕陵县，“蚕陵，即古蚕丛氏之国也”（见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引唐代卢求《成都记》）。而鱼凫的活动中心则已移至成都平原，广汉三星堆遗址很可能就是当时的都城。蒲泽又作蒲卑，即杜宇氏，都于郫邑，很可能在今郫县北边的杜鹃城。开明氏在开明九世时从樊乡（今彭州、新繁境内）徙都成都，时间大约在距今 2500 年以前。

开明氏晚期，北边的秦国已迈开了统一天下的步伐。按照“得蜀则得楚，楚

亡而天下并矣”(《华阳国志·蜀志》)的战略,秦并天下自蜀始。公元前316年,秦军南下,本年之中,先灭成都之蜀,再取江州(今重庆)之巴。巴国与蜀国不复存在。在巴蜀旧地建立了巴郡与蜀郡。蜀郡的设置,从秦代一直沿袭到唐代。唐代以后,蜀不再是行政区划之名,但川西乃至整个四川地区长期以蜀或蜀中作为代称。直到清末,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被推翻之后,重庆所成立的新政权仍叫“蜀军政府”。

综上所述,无论是巴与蜀,其概念的内涵都有一个由族名——地域名——国名——行政区划名——地域名的变化过程。今天则用作四川地区的代称。

我们说巴蜀是四川地区的代称,这只能是一种大略的提法,严格来讲是不够准确的,因为:(1)四川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划,从古至今,是在不断变动的;(2)今天四川省西部甘孜州的高原地区,习惯上都不视为蜀中的一部分。古代的巴蜀地区,大致来讲,主要就是指四川盆地。在元代以前,还长期包括陕南的汉中地区。从考古学资料可知,早在殷周时期,汉中地区就与古蜀文化密不可分,极可能是古蜀王国的一部分,后来秦与蜀曾反复争夺汉中。秦末刘邦为汉王时,所统治地区也是“王巴、蜀、汉中”(《史记·高祖本纪》)。故而当时人视蜀汉为同一地域,如《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卷蜀汉,定三秦。”更重要的是从文化上观察,是“与巴蜀同俗”(《汉书·地理志》)。故而当时将汉水两岸也称为蜀,如秦王迁吕不韦于房陵(今湖北房县),叫作“迁蜀”;刘邦封汉王,都南郑,韩信则说他“失职于蜀”。西汉时,汉中郡划属益州。这种格局,东汉、三国、西晋、唐、宋一直沿袭,直到元代,汉中地区才不再是四川行省的一部分而划归陕西行省。除汉中地区之外,在元代以前,今云南、贵州两省的北部与甘肃的南部,也曾长期与四川盆地同属一个行政区,但历代变化各异,古代这些地区又多是少数民族居住区,故而习惯上不把这些地区视作古代巴蜀的一部分。

川东称巴,川西称蜀,这也是一个大概的说法。其实,古代的巴还包括今天被称为川北的四川盆地北部的大部分。关于汉以前的巴蜀分界,文献上并无清楚的记载,蒙文通老师经研究后指出,巴与蜀之间,大致以涪江为界,而在个别地区各占东西。^①今天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基本上均从蒙文通之说。

在讨论古代的巴与蜀的有关问题时,巴与蜀得名的由来,即“巴”与“蜀”

^① 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巴蜀史的问题》第三节《巴蜀分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的本来含义是什么这一问题是必须注意的，四川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较为活跃。单是“巴”的本来含义，就有水名说、山名说、植物名说、动物名说、居处说、雄性崇拜说多种，动物名说中又有象蛇说、鱼名说，居处说中又有起于平坝说与起于石穴说两种，众说纷纭。限于篇幅，这里不作详细的引述，也不就各家之说一一品评。我认为，迄今为止所提出的各种说法大都忽略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明确的一个前提，即巴与蜀是早在殷商时期就和中原文化进行交流的古老的方国，同当时其他很多方国一样，被记录在甲骨文或其他中原文献之中的名称巴与蜀，是中原地区将对它们的口头称呼用中原文字系统即后来的汉字记录下来的，就是说，这有一个译音汉写的必然过程，在性质上与近代出现的“俄罗斯”、“英吉利”之类相似。更何况，古代的巴蜀地区无论语言与文字均与中原不同，这已得到了考古材料的确证（详后）。所以，如果仅据《说文》中的“巴，虫也，或曰食象蛇”，“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蛸蛸”这一类对汉字的训释来解释巴与蜀作为一个地域或民族得名的本义，是不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的。正如要用《说文》等字书中对“越”、“粤”与“濮”、“夔”诸字的训释来寻求古代南方民族得名的本义一样，是不可能的。根据上述这种认识，我认为以下的两种解释较为合理：（1）古代壮傣语系民族称鱼为巴（用汉字记录，也写为罢、霸、摆），最早以今天湖北西部长江两岸地区为活动中心的巴人，本是壮傣语系民族的一支，他们沿水而居，以船为家，以捕鱼为重要生活来源，在生活中与鱼的关系尤为密切，故而称为“巴”，其本义应是捕鱼的人，或以鱼为主食的人。^①（2）蜀族乃是古代氐羌的一支，从藏语与羌语进行考察，古代氐羌族称高原之人、山上之人为蜀（或译音为叟，为成，为滇），故而蜀之本义即为高原之人。^②后来，蜀王国的中心称为成都，公孙述在川西建国称为“成家”，李特在川西建国称为“大成”，这个“成”字，都应当与“蜀”字有关，因为“蜀”与“成”在古时本是一音异写。

至于殷周时期的中原人士为什么在音译时用“巴”与“蜀”这两个汉字，我认为不排除当时在双方敌对的情况下，于同音字中选择有轻蔑贱视之义的字，巴象蛇，蜀象虫，有如古代对周边少数民族称獠獠、鬼方，称蛮称狄，称獠称獠一般。

① 参见张勋燎：《古代巴人的起源及其与蜀人、僚人的关系》，载《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

② 参见温少峰：《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载《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1期。

第二节 关于“巴蜀文化”

“巴蜀文化”这一概念，是20世纪40年代初提出来的。1940年3月，徐中舒老师在成都出版的《史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古代四川之文化》一文，这是我国近代学者第一次从文化的视角对四川的古代作出粗略的描述。也就在这个时期，几位古董商将成都白马寺在30年代陆续出土的一批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和从各地搜集到的古代青铜器，均以白马寺出土器物之名运到当时的陪都重庆，引起了当时聚集在重庆的大批学者的高度重视，纷纷加以观察、研究，写出了一批论文。卫聚贤在他主办的《说文月刊》3卷7期（1942年8月出版）上发表了《巴蜀文化》一文，同时发表了缪凤林的《漫谈巴蜀文化》和其他几篇文章。这一期《巴蜀文化专号》在今天看来显得十分粗浅，而且又集中于少数器物的讨论，但却是“巴蜀文化”这一概念的初次提出与讨论。前辈开创之功，永不可没。在当时，“巴蜀文化”指的是秦统一之前古巴蜀地区的文化。在这段时期，董作宾、郑德坤、林名均、童书业、陆侃如、商承祚等学者对秦以前的巴蜀古史写过不少文章，这是自1930年吴致华《古巴蜀考略》（载《史学杂志》第2期）发表以来，对古巴蜀历史的探索达到的一个小高潮。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一文（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1卷，1941年9月）。此文的基本论点今天看来是不能成立的，但文中关于“古蜀国的文化究竟是独立发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的论述却是十分重要的、有预见性的观点，为近年来考古新发现所证实，开创了中国文明多元起源论的先河。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小高潮过去之后，巴蜀文化的研究一度沉寂。直到50年代后期，在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的激发下，在学术空气日益活跃的推动下，关于巴蜀文化的研究重新活跃起来。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邓少琴等老一辈学者发表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文章，中青年学者逐渐成为学术队伍的中坚，新的考古材料不断出土，巴蜀文化的研究愈来愈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重视。1979年4月，童恩正的《古代的巴蜀》一书出版，这是第一本较全面地综述古代巴蜀历史文化的研究著作。同年2月，巴蜀史研究会在成都成立，这是第一个研究古代巴蜀的历史文化的学术团体。由该会组织的，由笔者担任责任编辑的《巴蜀史研究丛



书》在1981—1986年共出5种，这是第一次有计划有规模地出版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过，上述的巴蜀文化的研究，都是指的秦统一之前的巴蜀文化。

70年代后期，一些学者提出了广义的巴蜀文化这一概念，其代表作是笔者所写的《巴蜀文化》一书（1991年7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笔者在该书的《前言》中提出：“四川古称巴蜀，所以四川文化的研究一般都称为巴蜀文化的研究。巴蜀文化有两种含义，狭义的是指秦统一巴蜀之前还称为巴蜀时期的文化，广义的是指整个四川古代及近代的文化。我们是按广义的巴蜀文化来进行论述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支持。就在《巴蜀文化》一书出版之后不久，谭洛非在《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5期发表了《关于开展巴蜀文化研究的建议》，文中说：“巴蜀文化，是指四川省地域内，以历史悠久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为主体，包括省内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由古至今的地区文化的总汇。”

本书所称的巴蜀文化，就是指的上述广义的巴蜀文化。

第三节 巴蜀文化的兴衰轨迹

1986年10月，在长江三峡北岸的巫山县大庙乡龙坪村龙骨坡，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化石（其中有带两颗白齿的下颌骨一块、门齿三枚），经用古地磁法测定，距今204万—201万年。这一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今天被称为“巫山人”。与巫山人同时出土的还有加工和使用过的骨器，有数十种哺乳动物化石。巫山人是巴山蜀水已知的最早的人类活动的见证。从这时起，我们的先民就已开始了文化的创造，尽管它是极其原始的、粗放的。但应当认为，巴蜀文化的序幕应当从这时拉开。

晚于巫山人的古人类化石，已知的有1951年发现的资阳人和1980年发现的筠连人，都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在10万—5万年之间。至于年代更晚一些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则分布较为广泛，如铜梁张二塘、资阳鲤鱼桥、汉源富林镇、成都羊子山、重庆九龙坡、黔江红土湾等，都是盆地中古人类在各地活动的遗迹。

盆地中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已发现两百多处，可谓遍布各处，其时代大致在8千年前至4千年前之间，此时的巴蜀先民已经迈进了文明的大门，有着原始的农

业、畜牧业与传统的渔猎经济，纺织与制陶成为手工业的主体，商品交换、贫富分化、原始宗教、聚居房屋等都已出现，巴蜀文化的序幕已经全面拉开。这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以广汉、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文化，因为它是盆地内新石器时代与铜器时代发展程度最高的早蜀文明的直接渊源。

举世闻名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是早蜀文明的集中体现。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始于1929年。1933年冬至1934年春，有了第一次小规模发掘。从1958年到1986年，这里进行了多次发掘。1986年7月和8月，震惊中外的两个祭祀坑遗物相继重现于人间。经过一段时期的研究，可知三星堆遗址的文化遗存分为四期。最早的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晚的在商末周初。最引人注目的文化遗物在第二、三期，时间为距今4070—32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的夏末商初至商代后期，也很可能就是《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中记载的古代蜀王鱼凫氏时期的蜀国都城。这里，有高大的城墙与深广的城壕，有全世界最大的青铜雕像群和最长的黄金权杖，有罕与伦比的玉石礼器，有来自南方的印度洋海贝，有来自中原的青铜酒器。这些实物再加上同一时期的成都十二桥发现的规模宏大的木结构宫殿遗址和成都羊子山发现的高10米、底宽103米的方形三层巨形祭祀用土台，充分表明，国家已经形成，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已经不低，对外交流的渠道早已通向远方。

金沙遗址位于今天成都市主城区之内的西二环与西三环之间，最初是2001年2月在一个住宅小区的建筑工地上发现的，已探明的遗址面积约5平方公里。通过几年来的多次发掘，在这里发现了从比三星堆文化还要早的宝墩文化遗存一直到明清时期的文化堆积，证明了成都是一个延续时间长达4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金沙遗址的各个文化层中最为重要的是这里的古蜀文化遗存，多数考古学者将其归于成都地区的十二桥文化时期，其年代约当商代晚期至春秋，绝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150年—公元前600年，很明显是上承三星堆文化的古蜀文化遗存，而且很可能是继三星堆之后的又一个古蜀都邑。在金沙，出土了震惊世界的、已被确定为我国文化遗产标志的太阳神鸟金箔，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金器、陶器、石器、青铜器、象牙。这其中金器的数量、玉器的数量、石质雕塑的数量、象牙的数量都是我国所有的先秦文化遗址之中最多的。从这些大量的出土文物中，不仅可以看到当年的文化发展程度之高，也可以看到当年蜀中与中原地区、与华东沿海地区已经有着明显的文化交流。



三星堆文化与金沙文化是早蜀文明的代表和标志，它充分表明，这个与中原的殷周王朝同时存在的古蜀王国所创造的古老文明是巴蜀文化第一个光辉的高峰，是长江上游的一个最重要的古代文明的中心。三星堆文化与金沙文化把我们对巴蜀文化的比较清楚的认识提早了一千多年，因为在它们发现之前，我们对早期巴蜀文化的了解是相当模糊的，基本上还停留在不多的汉晋文献的记载中。早期巴蜀文化的高度发展，也为中华民族起源多元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因为它说明，与中原的夏商王朝存在与发展的同时，在曾被认为是“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战国策·秦策一》）的巴蜀地区，还存在着一个独立发展的、独具特色的、又与外界保持着交流的古老的巴蜀文化。有一位北京的研究者见到关于三星堆文物的报道之后说过这样的话：“历来认为，战国以前的蜀国是一个封闭落后的国族，现在看来是大错特错了。”^①

到了战国时期，盆地中三星堆文明的光辉已经黯淡，巴王国与蜀王国的实力都不强，而北边，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则日益强大。巴蜀地区成为秦并天下的第一个目标。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军伐蜀，灭蜀王国，再灭巴王国，从此，巴蜀地区成为中原统一王朝的一部分。在经过了“车同轨”、“书同文”的一系列措施之后，曾经独立发展的早期巴蜀文化也逐步融入了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海洋之中，不再作为一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而存在，而是作为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大体同步而又保持着强烈的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而存在与发展。

秦并巴蜀，为巴蜀地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打开了大门，使中原地区较为先进的政治制度与生产技术大量传入（四川青川发现的秦为田律木牍与邛崃等地冶铁业的兴起是其明证），特别是秦王朝迁徙大量移民入川（近年在成都龙泉驿发现的大片秦人墓葬是其明证），更为巴蜀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秦王朝任命的蜀郡守李冰领导进行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和井盐、天然气的开采，更使蜀中的农业和手工业得以高速发展。再加之秦末汉初与西汉末至东汉初中原战火连年，而巴蜀的生活环境则相对安定，使得从战国末年到汉代的巴蜀地区在经济文化的发展速度上大大高于国内其他地区，在原来已有的基础之上，一跃而为当时全国最繁荣富庶的地区。成都不仅成为全国“五都”之一，据汉平帝元始二年（2）的人口统计，有人口35万，仅次于首都长安，位居全国第二。故而有“汉

① 张亚初：《论商王朝与古蜀国的关系》，载《文博》1989年第4期。

巴蜀文化志

家食货，以为称首”之誉（《华阳国志·蜀志》），以致取代了原来关中地区的地位而被喻为“天府之土”。第一次明确称巴蜀为天府的不是别人，正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诸葛亮。^① 不仅经济发展，文化也在全国领先，以司马相如、扬雄、王褒、严遵、李尤为代表的作家群“文章冠天下”（《汉书·地理志》）。文翁创建的石室讲堂是我国第一所由地方政府兴办的学校。以画像砖、画像石为代表的造型艺术在全世界也堪称一流，精美的丝织品与漆器已经由此走向世界。不仅如此，作为当时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巴蜀还多次为全国的统一起到了重要的后方基地的作用。秦国“灭六雄而一天下，岂偶然哉？由得蜀故也”（郭允蹈：《蜀鉴》卷一）；刘邦所以能得天下，司马迁认为是“汉之兴自蜀汉”（《史记·六国年表序》）。明代郭棐在《四川总志·序》（嘉庆《四川通志》卷首）也说：“秦资其富，以兼七雄；汉阶其力，遂奄四海。”应当认为，从秦统一到汉代，特别是西汉时期，是巴蜀文化全面发展，显示出光辉的第二个高峰。

西汉之后，巴蜀地区在三国时属于蜀汉，举国之力基本投入对外作战，民力消耗很大。从西晋时期开始，到隋统一全国，则内部战争不休、动荡不已，长期处于凋敝状态，是一个明显的停滞时期。

唐宋时期，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了全面的恢复与发展，重新站到了全国的前列，重新获得“天府”之誉，如著名文学家陈子昂说：“国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取给于蜀。又京师府库，岁月珍贡，尚在其外，此诚国之珍府。”（《上蜀川军事》，《全唐文》卷二一一）在唐代，与扬州并称“扬益（指益州，即蜀中）”，到北宋，仍称“扬一益二”（《资治通鉴》卷二五九）。一直到南宋，蜀中仍是“繁盛与京师同”（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这里是为人类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印刷术的发源地；全世界第一张纸币在这里出现；第一口小口盐井在这里凿成；这里兴建了全国最大的佛寺大慈寺、全世界最高的大佛乐山大佛，制造了古今绝世的雷琴。不特此也，李白在这里长大，杜甫在这里写下了他一生诗作总数的一半，吴道子在这里描绘了嘉陵江三百里山水，黄荃在这里开创了院体画派，王勃、高适、岑参、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贾岛、李商隐、韦庄、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纷纷入蜀，这里还是陈子昂、雍陶、薛涛、唐求、三苏、文同、张俞、苏舜钦、文

^① 参见袁庭栋：《“天府之国”由来的历史考察》，载《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1期。



及翁、张孝祥的故乡，真可谓是众星灿烂、群贤毕集，唐宋时代的巴蜀文坛之盛，可称是空前绝后。在学术上，著名史学家范祖禹、张唐英、李焘、李心传，哲学家李鼎祚、张行成、魏了翁、张栻，都为中华文化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在科学上，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和李石的《续博物志》是百科全书式的科技史资料，咎殷写的《产宝》是我国最早的妇产科专著，唐慎微写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是当时全世界最详备的药典，王灼的《糖霜谱》是当时全世界第一部制糖学专著，秦九韶写的《数书九章》把我国的古代数学推到了当时的最高峰。

很明显，唐宋时期是巴蜀文化第三个光辉的高峰。不过，这也是最后一个高峰。

唐宋时期巴蜀文化的繁荣，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环境的安定。正如五代著名诗人贯休在《陈情献蜀皇帝》一诗中所说：“河北江东处处灾，唯闻全蜀少尘埃。”隋末农民大起义、唐代的安史之乱、唐末农民大起义都未波及巴蜀地区，五代时期也相当平静。宋代的抗辽、抗金战争都在巴蜀以外地区进行（巴蜀军民为抵御金兵入侵在汉中地区的战争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些，使巴蜀文化有一个良好的客观环境得以发展。关于这一点，古人也有所分析，例如宋末著名政治家文天祥在《衡州上元记》（《文山先生全集》卷九）中就说过：“蜀自秦以来，更千余年无大兵革，至于本朝，侈繁巨丽，遂甲于天下。”可是，在宋元战争中，巴蜀地区却陷入了严重的战火，受到了极大的摧残。用上引文天祥的话说，是遭到一场“荡析”。从1231—1280年，巴蜀地区军民为抗拒南下的元朝军队，艰苦奋战50年，在全川展开了反复的拉锯战，成都曾三次被攻占。元军为了摧毁宋王朝这一块重要的后方基地，肆意摧残破坏，“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虽荒郊绝岛之间，无一处而不被燎原沸鼎之毒”（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载《宋代蜀文辑存》卷八四）。1223年巴蜀地区人口有259万户，到1282年，只剩下12万户。南宋时期，巴蜀地区占宋王朝全部岁入的三分之一，而到了元代，仅占全部岁入的百分之一。经济残破，必然带来文化的式微，如元初人说，“蜀祸之惨，诚不可言”（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史母程氏传》）；“文物泯尽”（罗寿：《成都瞻学田记》，载正德《四川志》卷三六）；“蜀学微绝”（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六《送赵茂元归乡序》）。整个元代，巴蜀地区文化全面衰颓，在全国文坛上有地位的学者仅有虞集一人，他也仅是自幼离开蜀中流寓江南并终身在江南生活的“蜀籍”文士

而已。

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红巾军首领明玉珍率军由楚入蜀，“尽有川蜀之地”，于1363年在重庆称帝，国号大夏。明玉珍死后，传帝位于其子明升，年仅10岁。诸将为争权夺利而大动干戈。已在应天（今南京）建立明朝的朱元璋派军伐蜀，灭夏，于1371年平定全川。所以，在元末明初的这段时间，巴蜀地区基本上仍在动乱中渡过，稍有复苏的社会生活又一次被破坏。明洪武五年（1372）统计，全省人口竟只有8.4万户，比元代初年还少。

明代近三百年，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都有恢复，人口增加（其中包括大量移民入川），农桑兴旺，处处兴学。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惟慎为第一”（《明史·杨慎传》）的大学者杨慎、理学家赵贞吉、易学家来知德等一批杰出人物，各地已出现一定的繁荣气象。可是在明末清初，巴蜀地区出现了连续80年的战乱加天灾。从明万历年间到明末，先后有土司杨应龙与奢崇明的大规模叛乱，省会成都就已是“围城百日，大肆屠掠，所称沃野，已半没于荒烟茂草中矣”（康熙《成都府志》卷三五）；川东重镇重庆也是“一夜尽成焦土”（道光《綦江县志》卷五）。与此同时，全川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以“除五蠹”为中心的农民起义。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几次入川，最后张献忠在成都建国，与明军及地方武装在全川进行了激烈的争战。张献忠抗清失败，清军入川，形成张献忠军、清军、明军三方争战的局面。清军占据全川不久，又爆发了吴三桂反清的战争，吴的巢穴虽在云南，但军队一直打到汉中，几年作战的主战场仍在四川。就这样，蜀中经历了连续80年的战火，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方才平息。而战火又带来饥荒，再加上天灾，故而“人相食，草木俱尽”；“官民庐舍、仓库、典籍荡然一空，靡有孑遗”之类记载随处可见，并非都是夸饰之词。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三个事实：（1）据近年各地的考察，四川的明代建筑是微乎其微，成都市区内则是一间也无。（2）清初，四川巡抚不能入住成都，因为成都无人无房，野兽纵横，故而只能住在保宁（今阆中）。顺治十七年（1660）才开始在成都修建官署，直到康熙四年（1665）各官署才全部迁入成都；至于各县，普遍是康熙年间才修造县衙。（3）顺治十八年（1661），四川清理户口，全省入籍者只有人丁16096人，按一丁五口计，也只有8万人左右。这个数字，估计是偏低的。经过当代研究者的探索与校正，康熙九年（1670）的